

## 引 言

虽然马丁·海德格尔直到在 1946 年秋季所写的《论人类中心论的信》（国内学者一直误译和误解为《论人道主义的信》）中，才公开承认他在《存在与时间》（1927）后经历了一个思想转折（Kehre），但是这个思想转折实际上早在 20 年代末 30 年代初就开始了。当人们直到在 40 年代，特别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有机会读到海德格尔在 30 年代撰写的、直到 40 年代才陆续首次发表的一些重要著作时，人们并未去注意这些重要著作的写作时间，而是根据这些重要著作的出版时间，误以为海德格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后期，甚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经历了一个思想转折。海德格尔本人对这种误解予以反驳，他承认他的思想转折并不是短短几年就能完成的，而是需要经过十几年的酝酿才能在 1946 年完成。这样推算起来，海德格尔的思想转折产生于 20 年代末 30 年代初。西方的海德格尔专家们根据他们对海德格尔著作的实际研究，有的认为这个思想转折产生于 1929 年的弗莱堡的就职演说《什么是形而上学》，有的认为产生于 1930 年的《论真理的本质》，有的认为产生于 1930—1931 年的《柏拉图的真理学说》，有的认为产生于 1935 年的《艺术作品的本源》。他们的着眼点不同，因此就有不同的结论，这是并不奇怪的，因为海德格尔本人一直处在不断探求的道路上，他的思想在长时间内并未定型，他在他的众多的著作中从各不相同的概念方面去进行探求，他走的并不是一条笔直的路，而是在不同的路段甚至在一些弯曲的道路上行走。在谈到海德格尔的思想之路时，西方学者注意到要使用德文词

“路”的复数形式，即 Wege。海德格尔那惊人数量的著作（德国从 1975 年开始出版《海德格尔全集》，预计大约 70 卷！）和众多的术语，本来就给研究者们很大的解释余地。但是，总的说来，西方的海德格尔专家们对海德格尔思想转折产生日期的一些看法与结论，与海德格尔本人公开发表的看法是大致吻合的。从这个思想转折产生时起，海德格尔的后期思想在不断地酝酿和发展。有的研究者把海德格尔的转折时期的思想（到 1946 年的《论人类中心论的信》为止）称作他的中期思想，把此后的思想称作他的后期思想，用以突出他的《论人类中心论的信》的纲领性的重要地位，这并无不妥之处，但是，总的说来，在《论人类中心论的信》的前后，海德格尔的思想已不存在实质性的大区别，《论人类中心论的信》并不象分水岭和分界线那样可以隔开两种不同的思想。所以，为了连贯地叙述海德格尔的思想，我把有的研究者所说的中期思想和后期思想统称为后期思想，而不根据海德格尔的自然寿命的年代去形式上区分出中期思想和后期思想。

海德格尔的后期思想是一种诗化了的的思想，他的语言是一种诗化了的语言，他本人则被称作诗人哲学家。他那表面上似乎并未用严密的逻辑语言，而用诗的语言所阐发的思想，是一种独特的思想，在西方 30 至 50 年代的思想界独步一时，令当时的西方思想家们目瞪口呆。卡尔·勒维特是海德格尔的最年长的学生，从 1920 年起即与海德格尔有通信联系，他在海德格尔那里学习的资历比海德格尔的那位赫赫有名的大弟子伽达默尔还要早至少 3 年。勒维特在他的名著《海德格尔：贫乏时代的思想家》中就很困惑地说：“常常不能断定，海德格尔到底在思维般地写诗呢，还是在诗意般地思维。”<sup>①</sup>他的一些后期著作和文章在名称上就多多少少地带有一些诗的色彩，例如《林中路》《田野之路》《通向语言之路》《人诗意般地居住》等，使专门用严密的逻辑语言写作与

《海德格尔：贫乏时代的思想家》，1953年，法兰克福，第 11 页。

思考的哲学家们感到困惑。后期海德格尔对传统的欧洲理性、主体性、人类中心论、逻辑、自我意识的批评，他对通常的伦理学、语言学、美学等各门科学的几乎不予理会的态度（他的基本信念是，各门科学固然正确，但缺乏“更本源的思想”“更本源的发问”）使西方人认为冷落了他们的各门科学，差不多要引起抗议。哈贝马斯就曾抱怨地说，他所关心的社会生活中的交往并不是海德格尔哲学的基本词汇。后期海德格尔对现代技术的探讨，又似乎在做一件只有工程师、技术专家、技术史专家才擅长的事情，他做此事似乎是门外汉在做吃力不讨好的事。后期海德格尔对中国古代思想家老子、庄子的研究与探讨，其乐陶陶，甚至在 1946 年与我国学者萧师毅先生合作，试图把老子的《道德经》译成德语，更使 40 到 50 年代的西方人，包括他的同胞德国人，都掉入了云雾里。在一个很长的时间里，海德格尔对西方人来说完全是一个无法解开的谜！

另一方面，海德格尔的思想在西方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截止到 1982 年，由德国波鸿市鲁尔大学的哲学教授汉斯·马丁·萨斯所制订的并在美国发表的世界上关于海德格尔的论文和著作的文献目录已包含 5400 左右的数目。在 1989 年海德格尔百岁寿辰时，他的影响达到了最高潮：德国最著名的基金会——洪堡基金会为他的百岁寿辰在波恩召开了大型国际学术研讨会，会后由洪堡基金会资助，出版了三卷本的论文集《论海德格尔哲学的现实性》，并在第二卷的封面的出版说明中已把海德格尔看作 20 世纪的德国哲学家中对世界产生过并还在产生着最大影响的一位哲学家。在 80 年代和 90 年代初，西方学者已普遍认识到：海德格尔很早就预见到 20 世纪科技的迅速发展在此世纪末所引起的全球性的生态危机，海德格尔的后期思想原来早已在呼吁保护地球，力图使技术时代的人类摆脱严重的危险和困境。海德格尔后期思想的主题是拯救地球，维护人类的基本生存条件，维护人类在地球上的长久生存，这已经是西方学者达到的认识。

以上是对本书的题目《拯救地球和人类未来——海德格尔的后期思想》所作的题解。无论就海德格尔的巨大影响而言，还是就他在 30 年代就提出的拯救地球这个问题而言，海德格尔的后期思想都值得我国学术界引起高度重视。

### 一、海德格尔后期著作的两个时间差

所谓海德格尔后期著作的两个时间差，第一，指的是海德格尔的一些重要著作的写作时间与公开发表时间之间有一个很大的时间差；第二，从海德格尔刚发表他的一些重要著作时起，直到西方学者们逐渐了解这些重要著作的真正含义，这之间有一个更大的时间差。

海德格尔生于 1889 年，在 1976 年去世，他活了 87 岁。他的全集约 70 卷，这意味着他如果从 17 岁开始写作，则每年必须写出一本书来，直到 87 岁去世。这是一个惊人的数字，说明他毕生都在勤奋地写作，真正是一位著作等身的思想家。在德国，一位思想家或哲学家在去世后，别人能为他出版十来卷的全集，就是很不容易的了。而海德格尔的全集数量几乎是这些人的七倍！在他的一生中，他有两个十年只写作而几乎不发表。第一个十年是从 1916 年到 1927 年，即在他授课资格答辩后十多年未发表任何东西，直到在 1927 年才发表了轰动一时的《存在与时间》。第二个十年是 30 年代，他很可能只发表了《荷尔德林和诗作的本质》。这是他 1936 年 4 月 2 日在意大利罗马所作的报告，1936 年 12 月在德国的《内部帝国》上发表，1937 年在慕尼黑出版单行本。此报告的日文翻译本发表于 1937 年 8 月，1938 年 3 月又出版单行本。法文翻译本 1938 年在巴黎发表。

直到 40 和 50 年代，海德格尔在 30 年代写作的一些重要著作才陆续开始出版。他在 1930 年写的《论真理的本质》在 1943 年才发表。他在 1930 到 1931 年写的《柏拉图的真理学说》在 1942 年才发表。他在 1935 年写的《艺术作品的本源》在 1950 年才收

在《林中路》中发表。他在 1936 年到 1938 年写的《哲学论文集》直到 1989 年才发表，而且还是为了纪念他百岁寿辰而提前发表的，因为他在晚年还从事于他的全集的出版和计划，为自己的全集题辞：“路，——并非著作”，曾留下遗言，须等他的弗莱堡时期和马堡时期的全部讲演集出版后方允许出版他的《哲学论文集》。既然此著在他百岁生辰时提前出版，可见他的弗莱堡时期和马堡时期的讲演集还未全部出版。看来，对海德格尔的研究还要走一条很长的路。

由于海德格尔的一些重要著作虽产生于 30 年代，但发表于 40 年代和 50 年代，人们也就只能从 50 年代起才有机会读到这些著作。这是由海德格尔著作的推迟发表引起的。

从海德格尔在 1947 年首次发表《论人类中心论的信》以及在 1950 年出版的《林中路》中首次发表了他在 30 和 40 年代写作的一些重要论文起，人们才有可能较全面地了解海德格尔在转折时期的思想，并开始作出评价。就已经发表的这些著作和论文而言，第一个时间差总算结束了。

这些著作和论文的公开发表已经晚了许多年，而要理解这些著作和论文，则要晚更多年。下面，简单介绍一下西方一些著名的哲学家和学者在 50 年代对海德格尔的这些著作和论文的评价。

雅斯贝尔斯是当代德国著名的哲学家，曾是海德格尔的很重要的朋友，彼此之间曾携带家眷去对方家作客，还小住数日。彼此之间赠送新出版的著作。由于历史的原因，在纳粹统治时期（从 1936 年 5 月 16 日起）直到 1949 年，两人之间的通信联系中断了。在 1949 年后才恢复了通信联系。在 1950 年初雅斯贝尔斯读到了刚出版的海德格尔的《林中路》他在 1950 年 1 月 14 日给海德格尔的信中说：“您实际上预见到什么，我无法说出。”

① 瓦尔特·皮默尔：《论雅斯贝尔斯和海德格尔之》的书信来往》，载于《论海德格尔：哲学的现实性》，第 2 卷，1990 年，法兰克福，第 83 页。

卡尔·勒维特是胡塞尔的学生，很可能海德格尔当时已是胡塞尔的助手，所以，勒维特也承认自己是海德格尔的学生。他生于 1897 年，在 1973 年去世，是西方很出名的著作家，《从黑格尔到尼采》是他的名著，德国人在 1981 年到 1988 年在斯图加特给他出版了九卷本的全集。他在 1953 年出版的著作《海德格尔：贫乏时代的思想家》中，叙述了海德格尔从《存在与时间》到《论人类中心论的信》和在《林中路》中收集的从 1935 年到 1946 年间的论文的发展道路。令人奇怪的是，他对海德格尔在这一发展道路上的观点的叙述多用德语的第一虚拟式，这种语法现象表示勒维特对海德格尔思想的介绍只取客观主义态度，并不带有赞同和同情，并不表示认同。这种做法在德文写作中是很少见的。勒维特的此书出版得太早了一些，未能读到海德格尔在 1953 年后发表的技术批评理论，所以他无法理解海德格尔的思想转折中所包含的强烈的现实意义。他是海德格尔的最早的学生，本应对海德格尔很了解的，但因未能读到海德格尔在 1953 年后发表的著作，就无法理解海德格尔，这一事实也说明了必须把海德格尔从 30 年代到 60 年代的著作综合起来考察，统一归入一个思想时期，即他的后期思想，才有可能充分地理解他的思想。勒维特对海德格尔的不理解，使海德格尔感到非常失望，他在 1961 年 4 月 12 日给别人的信中这样评价勒维特：“他是一个很熟练的作家，但他不懂得什么叫思想。”直到 1969 年海德格尔 80 岁生日时，勒维特才认识到海德格尔的思想意图在于：在西方的技术世界中维护天然的自然。勒维特向海德格尔表示生日庆贺，称海德格尔是他的“唯一的”教师，并感谢海德格尔的这一思想意图。

卢卡奇是东西方均很闻名的著作家，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版了一本很厚的书《理性的毁灭》，从封建阶级反对法国大革命一直谈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欧美思潮。他在此书中引用了海德格尔《林中路》中的《阿那克西曼德的格言》（1946 年）的一段话：“我们是否完全处在全球的最巨大的变化与这一变化所依赖的历

史领域的时期的前夕？我们是否处在另一个早晨的前夕？我们是否正在启程以便进入全球这一晚上的历史性的境地？西方是否刚刚出现？这一西方是否要超越西方和东方并超越欧洲阶段而成为未来的、更为新生地被派遣来的历史的舞台？我们这些同时代人是否在明了我们在转向世界之夜的意义上已经是西方的？……<sup>①</sup>

卢卡奇无法理解海德格尔的这一连串的发问的含义，他怀疑海德格尔是在暗示美国或德国统治世界的时代的到来。其实，海德格尔的这段话完全不具有政治色彩，他在这篇文章中谈的是西方新时代的绝对的主体性已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应该向它的迄今的、由形而上学打下烙印的本质告别了。卢卡奇完全误解了海德格尔。在对海德格尔的批评中，卢卡奇与当时也不理解海德格尔的勒维特联合起来。卢卡奇引用了勒维特对海德格尔的《什么是形而上学？》的第四版和第五版后记的修改之处所作的嘲笑讽刺。既然卢卡奇投之以桃，勒维特就还之以李，他也引用卢卡奇一段批评海德格尔的话，卢卡奇在这段话中认为海德格尔的《论人类中心论的信》导向无名的虚无。

从以上介绍的雅斯贝尔斯、勒维特和卢卡奇的评价来看，海德格尔的后期思想在 50 年代的西方思想界得不到理解。

自 60 年代起，在西方工业化和技术化最发达的美国，由于技术的极端发展导致环境污染、生态平衡破坏等社会问题，美国人开始对海德格尔的后期思想加以注意。但就西方整个范围来看，尚无材料能证明海德格尔思想中的现实性已引起西方人的普遍注意。即使在海德格尔的故乡德国，同一位哲学教授在 60 年代和 90 年代对海德格尔思想的阐述具有很不相同的特点和风格。在这里，我们介绍一下德国哲学教授奥托·珀格勒。

<sup>①</sup>《理性的毁灭》，参见宋祖良所译的后记部分，山东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752—753页。原文出于海德格尔的《林中路》，1980年，法兰克福，第321—322页。

《理性的毁灭》，第751—752页。

《海德格尔：贫乏时代的思想家》，第54页的注。

珀格勒生于 1928 年，年轻时学习历史和法学、哲学。他在 1963 年发表了《海德格爾的思想之路》。他在写作此书时曾得到海德格爾本人的帮助，海德格爾同意约珀格勒进行较长的谈话，并提供未发表的《哲学论文集》的手稿给他使用，还对此书的一些章节的写法给予指点，进行详细探讨。在此书发表后，海德格爾还读了此书，确认此书的叙述比较适宜。这部 60 年代的著作还只是叙述海德格爾思想的理论部分，并未太强调它的现实意义。在 1983 年第二版的增补的后记中，情况仍然如此。在 1990 年第三版的增补的后记中，情况则有了根本的改变。在第三版的后记中，珀格勒说：“拯救‘地球’这个主题已经贯穿了《哲学论文集》。”<sup>①</sup>在《海德格爾的思想之路》的 1963 年的第一版中，珀格勒就已经提到了海德格爾的未发表的重要手稿《哲学论文集》（1936—1938），还作了不少引用，但珀格勒当时并未揭示出其中包含的拯救地球这个主题。在 1983 年第二版的后记中也未做到这一点。为什么他在 1990 年的第三版的后记中可以做到这一点呢？其中的原因是每一个中国读者都可以猜测到的，即在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全球性的生态危机和拯救地球的强烈呼声，已使海德格爾的《哲学论文集》中所包含的预见性和强烈的现实意义异常鲜明地突现出来。许多哲学家、教授、专家、学者参加 1989 年为海德格爾百岁诞辰举行的大型国际学术研讨会，从他们提交的大量论文中，已使珀格勒在第三版的后记中可以概括出第一个重要问题：“在技术世界中如何能保护自然。”<sup>②</sup>可见在 1989 年，西方哲学界已普遍地高度重视海德格爾后期思想中所包含的强烈的现实意义。他们提交的大量论文，分三卷出版，总题目是《论海德格爾哲学的现实性》，海德格爾思想的现实性已成为西方海德格爾研究中的主题。趁这样的形势，珀格勒还在第三版的后记中，对海德格爾的一个名句

《海德格爾的思想之路》，第 389 页

② 《海德格爾的思想之路》，第 346 页

“只还有一个上帝能够救渡我们”中所包含的意义作了明确的解释。海德格尔在 1966 年 9 月 23 日曾接受德国著名刊物《明镜》的记者的采访，采访录的题目就是这句名言。根据海德格尔本人的要求，这篇采访录必须在他去世后才能发表。因此，在海德格尔于 1976 年 5 月 26 日去世后，在下半年发表了这篇采访录，《只还有一个上帝能够救渡我们》，这个标题到底是什么意思，一直引起人们的猜测和讨论。珀格勒解释说：“‘只还有一个上帝能够救渡我们’，这指的是，在无尺度的技术行动中，只有在下述情况下才有拯救，即当我们又为我们的生活寻找到一种尺度，正如雅典人在高居于城市之上的庙宇中的女神那里找到了这样的尺度。”<sup>①</sup>看来，由于技术的无节制的发展有可能威胁人的基本生存条件，海德格尔才假借希腊雅典的女神，提醒人们在技术世界中找到适当的尺度。因此，海德格尔的这句名言也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在本世纪快结束时，人类遇到了自从有人类史以来从未遇到过的生死攸关的大问题：生态危机和拯救地球。这一大问题恰恰在为海德格尔的后期思想作注脚。当西方的海德格尔专家们普遍地认识到这一点时，遂在西方 80 年代和 90 年代初的海德格尔研究中出现了与以前完全不同的面貌：第一，研究者不再重视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不再重视他的生存哲学，而是重视他的后期思想中“拯救地球”这个有强烈现实意义和现实性的主题；第二，研究者不再只搬弄海德格尔的一些抽象术语，如 Sein（存在）Dasein（此在）Ereignis（未隐蔽状况的发生）Lichtung（澄明）Wahrheit des Seins（存在的真理）等，而是把海德格尔的这些抽象术语所包含的现实意义，用研究者自己的语言“翻译”出来，揭示出来，使之成为现实的语言；第三，由于海德格尔认为艺术在技术世界中有拯救作用，遂使西方的学者们热心于研究艺术与技术的关系。只有了解并注意这些最新动向，中国的

海德格尔研究才有新的不同的面貌，才有新的生命力，才能赶上西方 80 年代 90 年代初的水平！

当一位天文学家预言 50 年后的某一天将在天空中出现一颗彗星（俗称扫帚星、灾星）时，那么，他必然会面临两种截然不同的命运：在这一天到来之前的漫长岁月中，他免不了受尽人们的怀疑、讽刺和挖苦，人们难免心存疑虑，怀疑他的预言是否可靠；在他的预言如期证实后，所引起的轰动又是可想而知的。海德格尔在 30 年代发出的“拯救地球”的呼吁，在半个世纪后得到了证实。他的后期思想是一种超前意识的预言性的思想，理解这一思想需要很长的时间。当他的预言性的思想得到证实时，他的后期著作的第二个时间差才告结束。

## 二、我国对海德格尔后期思想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在 60 年代，我国已经出现了海德格尔后期著作的一些零星的中文翻译如《论人类中心论的信》（1963 年，当时把篇名误译为《论人道主义的信》），《林中路》（1964 年，节选）。这两者加在一起，约 4 万字。

自 80 年代以来，培养了一些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研究海德格尔的学者人数逐渐增多。有的研究生开始以海德格尔后期思想作为自己学位论文的题目。

总的说来，国内对海德格尔的研究还是侧重在他的早期的《存在与时间》（1927）上。对《存在与时间》进行专门研究，这并非不可以，也并非不重要，西方哲学界经常把这本著作比作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和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甚至把它视为黑格尔以来最出名的西方哲学著作。问题在于，不能把海德格尔的这本早期著作看作是他的唯一重要的著作，仿佛《存在与时间》就是他的经典，仿佛只要一册《存在与时间》在手，海德格尔就成了囊中之物。这种想法是非常幼稚可笑的，完全否认了海德格尔的思想在以后还有近半个世纪的发展，还写出一系列超出

《存在与时间》的重要著作。这种想法类似于：一个人明明已读书读到研究生毕业，拿到了硕士学位或博士学位，但别人在他的“学历”这一栏内偏偏只填上“初中毕业”。当然，在后期海德格尔的重要著作尚未成本地译成中文的情况下，出现一些幼稚可笑的想法也是很正常的。

研究《存在与时间》的人们，应该掌握分寸，了解他们从此一著作中得出的结论的适用范围，切不可随意地套到后期海德格尔身上，切不可把它看作海德格尔一生思想的盖棺定论。可是，在 80 年代的研究中已出现了一些这样的倾向。因为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探讨了“存在的意义”，有的研究者就信口开河，说“存在的意义”是海德格尔毕生苦苦探索的唯一主题或唯一重要问题。其实，后期海德格尔已经用“存在的真理”这一说法取代了“存在的意义”这一说法，原因很简单，“意义”是对人而言的，具有主体性在下评判的意味，而后期海德格尔恰恰在反对西方技术世界中大大膨胀了的主体性。既然后期海德格尔已不使用“存在的意义”这一说法，何以能说“存在的意义”是海德格尔毕生在苦苦探求的主题？这说明一些研究者并未仔细地读过后期海德格尔的著作，连他的最基本的表述都未掌握，就已经在对海德格尔下大结论了。这个明显的失误很普遍地存在于许多学术论文中。又例如，有的研究者仅因为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说过没有 Dasein（此在）就没有真理之类的话，就下断言说：“事实上，海德格尔建立了一个‘人类中心说’。”<sup>①</sup>这位研究者显然不了解海德格尔在《论柏拉图的真理学说》和《论人类中心论的信》中都在大力批评欧洲传统中的人类中心论，他在后期思想中让人从属于存在，反对欧洲传统中的人类中心论正是他全部后期思想的纲领。说海德格尔建立“人类中心说”，这种说法完全不符合后期海德格

董润深：《海德格尔哲学的人道主义问题》，载《现代外国哲学论集》，第 2 辑，1982 年。

尔。这说明一些作者对后期海德格尔完全缺乏基本的了解。再例如，后期海德格尔写过一本书，名称为《Der Satz vom Grund》（1957），无论从德文的名称来看，还是从书中所探讨的问题来看，都是明确无疑地指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所建立的形式逻辑思维规律——充足理由律，但一位作者竟然把书名译为《基础原理》。中国的读者们读到这个《基础原理》，是否还会想到是莱布尼茨的充足理由律？这位作者连书名和这本书的内容尚未搞清楚，对他自己到底在谈论海德格尔的哪本著作都未搞清楚，就已经在对海德格尔的这本书下断言了。这位作者还说到“海德格尔的技术哲学”<sup>①</sup>。其实，海德格尔对现代技术只有追问和批评，对哲学则宣告它的终结，在他那里哪会有什么“技术哲学”这个不伦不类的名称？于此可见在一些人研究中的断章取义与随意嫁接。

有的研究者动辄侈谈海德格尔的存在论、本体论、存在、此在、澄明等一些大概念，如果问他这些大概念在后期海德格尔那里到底有什么现实意义，他觉得是个怪问题，回答不出来。似乎研究海德格尔只需从概念到概念，越空洞越好，越空洞越显得深奥莫测。西方的许多研究者已经开始把海德格尔的一些抽象术语所包含的现实意义，用研究者自己的语言“翻译”出来，揭示出来，使之成为现实的语言。如果我们还仅在概念里兜圈子，丝毫不接触现实，那么，这种空洞的研究又有何用？

有的研究者已经对海德格尔的前后期思想作了统一研究，备尝艰辛，写出了较有份量的专著，这确是很不容易的。但对海德格尔总体思想的评价，似有澄清的必要。俞宣孟先生在《现代西方的超越思考——海德格尔的哲学》中，时而把欧洲近代理性主义（如笛卡尔、康德、黑格尔等人的哲学）看作是理性的唯一标准，凡是有违于此的则都是非理性主义，因此，他把海德格尔哲学看作当代非理性主义的最高形式的哲学表述；时而又认为西方

莫伟民：《试析海德格尔的技术哲学》，载于《探索与争鸣》，1992年第3期。

历史中的逻辑思维并不是人类唯一可能的思维方式，非逻辑的思想并不比逻辑思想的价值要小，它同样是人穷究宇宙和人生的根本道理的一条途径。以黑格尔为例，欧洲近代理性主义就是西方历史中的逻辑思维，不可能设想欧洲近代理性主义可以没有它的逻辑思维，也不可能设想西方历史中的逻辑思维可以没有它的理性主义。为什么有违于欧洲近代理性主义就是非理性主义，而有违于西方的逻辑思维的非逻辑的思想却可以有正当的存在理由呢？这种说法似乎自相矛盾。能把欧洲近代理性主义看作是理性的唯一标准吗？中国古代哲学显然都不具有欧洲近代理性主义，难道可以因此把中国古代哲学都看成是非理性主义吗？当海德格尔超出欧洲近代理性主义和传统观念，向东方思想靠拢，与中国古代思想家老子、庄子寻求对话时，能把他对欧洲传统的背离看成是非理性主义吗？俞先生在书中把海德格尔哲学看作非理性主义哲学，而在标题中又把海德格尔哲学看作“现代西方的超越思考”，“超越”两字显然带有褒义，带有肯定和赞扬的味道。那么，到底该对海德格尔哲学作一个什么样的总体评价呢？

在中国对后期海德格尔的研究中，最大的曲折和挫折莫过于把海德格尔的《论 Humanismus 的信》（《论人类中心论的信》）错误地翻译成《论人道主义的信》。海德格尔认为，欧洲许多世纪以来，一直以人为中心，以人为主宰，把大自然看成征服和进攻的对象，无限制地通过近现代技术去对大自然进行掠夺和剥削，势必最终破坏人类的基本生存条件，危及人类生存。因此，他在后期集中反对欧洲传统的人类中心论，强调人类与大自然应该共生共荣，其思想境界十分类似于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的思想境界。无论在海德格尔本人的著作中，还是在德国学者的有关解释中，海德格尔反对 Humanismus 都是明确地指反对人类中心论

《现代西方的超越思考——海德格尔的哲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37—141页，第337页。

(对这一点,在本书中会有详细的介绍和探讨)。但我国著名海德格尔专家熊伟先生在 1963 年把海德格尔的这封信译成中文时,误译为《论人道主义的信》,把此信中所说的反人类中心论一律误译为反人道主义。在以后,国内的学者们都沿用了熊先生的这一错误译法,谬种流传,对海德格尔造成了莫大的误解。人道主义岂可加以反对?反对人道主义就是反对人本身,十恶不赦,所以,国内经常有文章把海德格尔反对人类中心论当作他反对人道主义加以批判。当西方人把海德格尔反对人类中心论看作他们环境保护主义的旗帜时,一些中国学者却很自信地在批判海德格尔反对人道主义。这种局面不早一天结束,中国和外国海德格尔研究就完全无法沟通与对话。

### 三、关于本书撰写的一些说明

我曾多年师从贺麟先生研究黑格尔哲学,先后获硕士学位与博士学位。在 1989 年 4 月,经过多次德语出国选拔考试后,由国家教委派遣,赴德国波鸿市鲁尔大学黑格尔档案馆进修与工作一年。我的邀请者即是黑格尔档案馆馆长、德国著名学者奥托·珀格勒教授。在世界上,他不仅是一位著名的黑格尔专家,而且又是一位著名的海德格尔专家。他的名著《海德格尔的思想之路》已被译成五种外国文字。在他的率领下,档案馆的研究人员均左右开弓,一手研究黑格尔,一手研究海德格尔。我也开始兼顾海德格尔哲学,选听了珀格勒开设的一些关于海德格尔的课程,阅读了一些关于海德格尔的专著。由于我过去是研究黑格尔哲学的,所以,初涉海德格尔哲学,感到很不习惯,觉得黑格尔的那些重要概念和思路在海德格尔处都失灵了。读黑格尔的书,犹如走西方哲学史的楼梯,一级一级地往上走,步步登高。读海德格尔的书,使我感到这楼梯不能再继续往上走了。后来,我才逐渐明白海德格尔的真正意图,用我的比喻来说,他看出了西方哲学史的楼梯建立在西方人长期与自然界相分离、相对立的基础上,这个基础

很隐蔽地构成了西方哲学和全部文化的核心。西方人把人类生存、繁衍的基地——自然界，看作技术生产征服和剥削的对象，把万物（包括人类）之母——大自然，看作进攻的对象，并且习惯成自然，认为这样做是理所当然、天经地义的。海德格尔恰恰看出这种做法和想法潜在地包藏着巨大的危险，西方哲学和全部文化正建立在一个危险的基础上。他实际上是要西方人思考：西方哲学史的楼梯建立在西方人长期与自然界相分离、相对立的基础上，在这样的楼梯上再继续盲目地走上去，再继续加剧西方人与自然界的分离和对立，是否会因基础本来就不很牢靠而致使这个楼梯全部坍塌下来，连人类的基本生存都成问题。东方的思想，特别是中国古代思想，强调天人合一，强调人与自然界的血肉般的联系和协调发展，这正是海德格尔要超越西方哲学和全部文化的传统，向东方思想靠拢，从而引导西方人走另一条新路的原因。在把握住海德格尔的这一真正意图后，我遂萌发了撰写本书的念头。

回国后先后翻译了珀格勒的《海德格尔的思想之路》德国哲学博士冈特·绍伊博尔德的《海德格尔分析新时代的科技》两本书。这两本书都从整体上反映出海德格尔的思想风貌。前者叙述了海德格尔从年轻时起直到1963年的思想发展，后者以海德格尔的技术问题为中心，全面地展开了海德格尔对欧洲传统文化的批评。翻译这两本书，使我对海德格尔思想获得了大致的了解。从1992年7月起，开始泛读西方学者论海德格尔的论文和专著，随后又泛读海德格尔本人的后期著作，每天阅读三、四万字的德文著作，重要之处均作笔记。经过十个月，阅读近千万字，作笔记二十多万字，为本书的写作打下了基础。

人类生存环境的破坏与保护，确实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时刻。1992年6月，全世界一百多个国家的政府首脑和环保部门的长官们云集巴西的里约热内卢，共同签发“环境与发展宣言”。这么多的国家首脑在一起开会讨论共同关心的重大问题，这在历史上是

很罕见的。共同的命运使世界各国——无论何种社会制度的国家，无论是大国小国，无论是何种肤色的民族——都走到一起开会提出环境保护问题，协调环境与发展关系，把环境放在优先考虑的地位，其次才有人类的发展。最近，一份由 1575 位科学家（包括 99 位健在的诺贝尔奖获得者）联合署名的声明，警告人类面临大灾难。这份题为《世界科学家向人类的警告》的声明指出，臭氧层变薄、空气污染、浪费食用水、海洋受毒、农地受损、森林面积减少、动植物种类减少是最大的危险。这份声明最后警告说：“在我们能够避开现在所面对的威胁及人类前景不可估量地消失的机会失去之前，我们剩下的时间不会超过十年或几十年。”<sup>①</sup>科学家是从自然资源在目前所受到的各种破坏程度看出巨大的危险的。而海德格尔在半个世纪前是从西方人与自然的久已存在的不正常的关系状况预先看出这巨大的危险的。他在后半生中为此思考了几十年。所以，他的思考中的合理而有价值的部分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这个问题关系到全人类的命运，既关系到西方人的命运，也关系到东方人的命运，既关系到你的命运，也关系到我的命运，没有一个人的未来命运可以离开对这个问题所作的回答。

在一些年轻人中，存在着一种看法。他们认为，西方哲学家分成两类：大哲学家和小哲学家。其著作一般人看不懂的，这样的哲学家才是大哲学家。把大哲学家的思想转达给一般人，使一般人达到可以理解，做这些工作的是小哲学家。这种划分哲学家等级的标准是很成问题的。中外哲学界没有人会否认海德格尔是大哲学家，但他的后期思想的主要倾向，从西方传统的角度来看，虽然很难理解，从中国传统的角度来看，却是不难理解的，从他的“拯救地球”的呼吁已得到全世界广泛呼应而言，更谈不上有什么难理解之处，正象大哲学家黑格尔的辩证法并没有难到常人

<sup>①</sup>《海外星云》，1993 年第 3 期，又见于《文摘周报》，1993 年 2 月 10 日第 4 版。

理解不了的程度。至于西方哲学教授迫于每学期要开设一门新课，不得不在烦琐的论证、生僻的术语上多下功夫，有时确实搞得玄而又玄，显得高深莫测，对这种现象，我们不能盲目赞赏，更不能以此作为划分哲学家等级的标准。如果一个人的想法越难懂越显得伟大，那么，最胡说八道的神学家岂不是最伟大的神学家？划分哲学家等级的标准，只能看他们为推进人类思维所作的贡献，而且这贡献的大小是由大家来评定的，为大家所理解的。能否把西方大哲学家思想中的合理而有价值的部分用我们自己的语言表述出来，使之成为现实的语言，这实际上在考验研究者是否真把西方哲学家的思想搞深搞透了，是否在表述时有清晰的思路，是否能熟练地驾驭大量材料，是否有足够的文字水平能把很复杂的难题说得十分清楚。总之，是对研究者的总体水平的考验。本书对海德格尔后期思想的阐发，力求使每一个有一定文化水准的中国读者都能读懂，并作出评价。海德格尔的后期思想决不是纯学术的象牙塔的尖端，也决不是研究者在标榜自己和孤芳自赏时可以借用的装饰品，它具有强烈的现实性和现实意义。

本书作者在研究海德格尔时，得到本研究室的叶秀山先生的多次勉励与支持。他本是国内希腊哲学的少数知名学者之一，掌握希腊文，独立担当多卷本希腊哲学史的写作，观点新颖活泼，材料丰富翔实，其治学方法影响了国内一些年轻学者。自从叶先生80年代在美国进修深造后，又大力开拓对西方现代哲学的研究，对诸多流派均有论述，已是国内很博学的很有声望的学者。就国内的海德格尔研究而言，叶先生也有特殊的贡献。他摆脱了一些研究者长期纠缠于海德格尔是否非理性主义者的争论局面，在《思·史·诗》中，把海德格尔看作当代少有的几个能配得上象笛卡尔、康德等这些大家那样具有独创见解的思想家，并称海德格尔是世界性的、国际性的大哲。这是国内哲学界首次给海德格尔充分肯定的评价。叶先生在该著中提出的一些见解，如海德格尔所批评的形而上学传统是主体与客体的分离和对立，海德格尔所